

汉语的文化透视

假定有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看到地球上有许多长着四肢的生命体，只要粗粗一看，他就可以把这些生命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立行走、穿着衣服、会说话的人类；另一类是不穿衣服、用四肢爬行、不会说话的动物。动物固然也会发出简单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还不是语音，因为它们的音节边界是不清晰的，意义是含糊的。人类的祖先大约在四百万年以前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了。原来由嘴担负的搬运、搏斗等工作在直立行走以后改由手来完成，这样以嘴为核心的发音器官才有可能为了交际的目的，发出越来越复杂的清晰的声音。

人类的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断代的直接证据。语言和文化应该是共生的。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相辅相成的过程。人类的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二百万年前，那时候应该已经产生一些意义明确的语音信号。洞穴绘画和原始雕刻之类原始文化大约可以追溯到五万年前，那时

候人类应该已经有相当发达的语言。而语言的充分发达至迟是在距今一万年以前，那时候农耕文化和最初的文字已经在西亚萌芽。

语言的诞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灿烂多姿的人类文明的序幕。如果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历史上的积极创造，那么语言应该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过由于语言在各种文化现象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人们常常把它从文化中分化出来，讨论它与文化的关系。语言的特殊地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语言（这里指母语）的习得是无意识的，如果没有生理缺陷的阻碍，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其他文化行为都要经过后天的艰苦训练才能获得，例如唱歌、画画、打球，且其结果会因人而异，决不会是平等的。

第二，语言是人类文化成长的契机和关键，其他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要以语言为基础。例如各种体育活动都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而规则必须用语言表达。语言可以说是人类文化成长树上的树根。

第三，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代码，特别是词汇更加明显。例如汉语在造词法上的某些词序反映中国人的某些传统思想，“男女老少、父母、夫妻、姐妹”这些词语的词序不能颠倒成“女男少老、母父、妻夫、妹姐”。这种词序的民族文化背景是“男尊女卑、长幼有序、敬老孝悌”的传统观念。

第四，语言，包括记录语言的文字是文化现象流传久远和长久的最重要的工具。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多姿多彩的，这本小书只打算就中

国的语言 and 文化的若干方面，分几个专题作些讨论，其中有些内容是从笔者的旧作《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摘录的。讨论时尽量避开语言学术语和较少见的国际音标，以提高可读性，有特殊兴趣的读者请参阅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

一、汉语的形成及其与 周边民族语言的关系

中国文明的历史，如果从古代文献来考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中国人从那时候开始自我认同，至今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自认是炎黄子孙。然而汉语的历史，充其量只能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殷虚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是最古老的汉语文献，它所记录的应该是商民族的语言。

那么，在商代之前建立夏朝的夏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与商民族的语言是不是同一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有些符号可能是最早的汉字，这些遗址从甘肃到台湾都有发掘，距今六七千年。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的话，那么似乎有可能是夏代的语言。其实这些符号决不是真正的文字的前身，因为这些符号的种类太少，而分布的地域过于辽阔。

商代甲骨文和后出的金文中的语音成分有相承关系，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从商代到周代的过渡，在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说得确切一点，应该是商代和周代的

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都是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之一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代的人民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也是汉语，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生活的地域，也许只有占人口少数的贵族才使用汉语。

上述原始汉语在周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称为“雅言”。据《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假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雅言”即“夏言”，也就是王畿或周室所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朝、聘、令、盟等政治和外交场合都以“雅言”作为正式的交际媒介。流传至今的“雅言”的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文献。雅言的确立对于汉语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秦时代虽然只有“雅言”，而没有“汉语”这个名称，但是现代语言学家通常把见于先秦文献的语言称为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 或 old Chinese）。“雅言”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它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当时国内语言或方言分歧异出，妨碍交际，不利全国统一。

“诗经”是构拟上古汉语的最重要的材料。《诗经·国风》按产生的地域分篇，包括周南、召南、卫、郑、齐、秦、唐、宋等十八个地域。“雅言”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上述不同的地域应有方言差别。例如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有关记载，秦、魏两地的方言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

《诗》三百篇本是民歌，最初应该用各地方言传唱的，后由士大夫整理，改用雅言记录。所以在《诗经》内部我们并不能看出有方言差别。

我们将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范围拟测为《诗经》十五国

风产生的地域。与上古汉语在地理上相邻的非汉语，据《左传》、《史记》、《孟子》、《说苑》等文献的明确记载有戎南蛮、楚、齐东、越等。这些语言跟中原的汉语不同，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

戎人的文化类型属游牧文化，跟华夏人的农耕文化不同，《礼记·王制》载：“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戎人跟华夏人不仅习俗和物质文化不同，而且语言也不同。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一位戎人首领驹支说：“我诸戎饮食服饰与华不同，贄礼不通，言语不达。”又据《史记》载，有一个从秦国逃到戎族所居地的难民由余，后来能操戎、华两种语言，戎人曾用他出使晋国。

驹支所说的“诸戎”至少包括“氐和羌”。据《说文解字》载，羌属于西戎。“羌”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早就见于甲骨文，也见于后出的《诗经》和《尚书》。在《诗经》和《荀子》里，氐和羌总是连用。戎人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北部 and 甘肃。

“羌”字《说文解字》收在“羊”部：“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看来戎人是游牧型民族。

一般认为戎人是现代使用藏缅语的民族的祖先。在汉代后期有些藏缅民族居住在今四川省的西部边境地区。《后汉书》将其归类于羌的支派。这些族群中有一种是白狼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一首用白狼语唱的歌，即《白狼王歌》。这首歌用汉字记音，并且用汉语释义，例如第一句的汉字译音是：“提官槐构 魏冒逾糟”，汉文释义是“大汉是治，与天意合”。语言学界通过与其他藏缅语的比较，一致认为以《白狼王歌》为代表的白狼语是属于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

古代羌族的一支唐古特人 (Tangut, 即党项羌族) 在唐代复出, 他们在十世纪至十三世纪在甘肃以及蒙古和陕西与之临近的地区建立西夏国, 并且创制西夏文。对西夏文的成功解读和考证表明, 西夏文所记录的是党项羌族的语言。这种已消亡的西夏语与现代四川羌族语言相近, 都是属于藏缅语族的语言。

在汉藏语系内部, 在语言系属上与汉语最接近的语言是藏缅语。这种亲属关系的主要证据是有共同的基本词汇和语音对应规律。汉语、藏语和缅语的同源词, 包括数词、身体各部分的名称、普通的动物名称或表示最基本的观念的词: 日、昼、夜、年、死、杀、松、苦、我、你等, 这样的同源词至少有一百个以上。下面是上古汉语、古藏语和古缅语的两条语音对应规律。带星号的语音形式是构拟的形式。

	古汉语	古藏语 *	古 缅 语	
1	* a	a	* a	
	* mrag	rmang	rmang	马
	* ngran	ngang	ngan	雁
2	古汉语	古藏语 *	古 缅 语	
	* i	i	* i	
	* sjid	chi < * syi	se < * syi	死
	* tjik	geig < * gtyig	tac > * tik	只

尽管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近年来又有了长足的进展, 已经找出了一批同源词, 并建立了若干语音对应规律, 但是想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方法, 象印欧语系那样, 深入准确地拟测原始汉藏人的家园、文化特征和移民运动, 还要走很长的路。从考古发掘的事实来看, 距今约六千

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有可能是原始汉藏人的家园。不过这个假说尚缺少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证据。

汉语和藏缅语互相接近固然是出于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但是也不能排斥两者早期的互相影响。族外婚至少从周代开始便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周王室和戎人就有通婚关系。周的两个最显要的姓氏是姬和姜，戎人也有这两个姓，《春秋》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述僖公联晋伐秦，其中提到姜戎。戎人也有姬姓，晋献王的妻室姓姜，她们是从戎人的两个不同族群娶过来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称重耳的母亲为“大戎狐姬”。重耳后来成为晋文王并且称霸各封建王国。

《诗·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原。”这是有关周民族始祖的最早记载。“姜”、“羌”古为一字。周民族本是生活在渭水上游漆水和沮水之间的戎族之一种，所以《孟子》指周文王为西夷。周民族自公刘以后渐渐东迁，并从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财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民族在东迁、克商、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与商等民族融合，而汇入华夏民族的大流中。其原有的戎语也自然溶入中原的华夏语中。

南方诸民族泛称“蛮”。《礼记·王制》载：“南方曰蛮。”《大戴礼记·千乘》也载：“南辟之民曰蛮。”上古时代诸“蛮”之中最为显要的是“苗”蛮，所以典籍中常有“苗、三苗、有苗”等族称。南蛮盛行“盘古开天”之说，与华夏尊黄帝为人文之祖不同。南蛮的语言与华夏语也大不相同，据

《后汉书·南蛮传》载：“衣裳斑斓，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南蛮是现代苗瑶人的族源，其最确凿的证据之一是两者都崇拜盘瓠犬祖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晋干宝《搜神记》和唐樊绰《蛮书》都载有盘瓠犬神话。《后汉书》在述及长沙蛮和武陵蛮时也提到这个神话。南蛮侏离的语言后世就发展为苗瑶语。

上古时代苗瑶人居住地的确切境界线是很难确定的，只能对它的东境可以作些推测。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现代畚族在古代是说瑶语的，而且也崇拜犬。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应该是苗瑶人之一。畚字也读作 yu，意思是“刀耕火种”。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农耕方式的关系，他们被称为畚民或畚蛮。现代畚族较集中的居住地是浙南和闽东，江西、粤东和皖南只有少量分布。粤东博罗的一千多畚民至今仍使用类似瑶语的语言，其他地方的畚民则早已改用类似客家话的汉语方言。粤东应是畚族的原始家园。粤东的畚民后来有一部分北上进入福建，学习当地的客家方言，最终实现了语言转型。因此上古时代苗瑶人居住地的东界有可能是粤东。另有一种猜测认为东界在江淮之间。理由是这样的：畚字的古音与“舒”字很接近，“舒”是一个族称，《左传》多次提到它，称其为“群舒”或“众舒”，说它住在楚和徐之间。据杜预的注解，他们的住地与安徽的庐江邻接，即在楚和吴之间。今天庐江的邻县仍称“舒城”。他们很可能是现代畚族的先民。

苗语和瑶语是同出蛮语的不同支派。只是现代苗语的韵母系统大为简化，但保留复杂的声母系统，而瑶语则简化了声母，保留较多的韵母。对苗瑶语的语言亲属关系，语言学

界还是有争论的。本书暂时将其归于汉藏语系，不过与汉藏语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要确定苗瑶语的系属问题，还要做很多研究工作，不仅只是分辨汉语借词的层次，并且还要研究南方方言中的苗瑶语底层问题。

用汉字记录的古苗瑶语材料罕见，有一个例子是“寮”。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说山瑶居“打寮”。这里的“寮”是“小屋”义。“房子”今瑶语勉话称为 pjau3 湘西苗语称为 plu3。

秦汉以前，长江以南还是古越族所居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粤”和“越”作为民族名在典籍中相通，异字同指，《史记》即写作“越”。

据多种史籍记载，百越人民断发文身、崇拜龙鸟、善于用舟、巢居干栏、种植水稻、饭稻羹鱼、制作几何印纹陶，百越的这些文化特征显然跟华夏大不相同。这些文化特征大多也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应是百越人的家园。

越语跟华夏语也是大相径庭的。今江浙一带的越人在春秋时代分属吴和越两个国家。当时中原的华夏人称他们的语言为“夷言”，以别于华夏语。“夷言”有两大特点。

第一，人名和地名带有词头。例如“句吴、於越、无余”这三个地名中的第一个字“句、於、无”在古越语中是所谓“发声”即词头。《左传宣公八年》疏：“於者，夷言发声也。”《汉书·货殖传》注：“於发声也，戎蛮之语则然，於越犹言句吴耳。”《汉书·地理志》载“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於越也。”《汉书·货殖传》孟康注“无发声助也。”

“句”和“无”这两个词头也常用于吴越人名，见于《左传》、《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有句践、句无、句檀、无疆、无余、无恠、无任。吴王“夫差”的“夫”字也是同类词头。

第二，词汇在语音结构上的特点是多音节，与华夏语词汇的单音节特点不同。《世本·居篇》注：“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汉杨雄《方言》所记录的有的吴越语词汇是双音节的，例如卷七：怜职（爱）煦焮（热）；卷十：短矮（短）；卷二：荆扬之间称“广大”为“恒慨”，东瓯之间称“广大”为“参绥”或“羞绎、纷毋”。

越语不仅有别于华夏语，而且跟齐语也不能通话。据《吕氏春秋·知化篇》载，吴王夫差就北征齐国事，征求伍子胥的意见，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之于我亦然。”伍子胥是从军事情报的角度提出意见，言之凿凿。

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载有一首《越人拥楫歌》，其歌词原是越语，用汉字注音如下：“滥兮汴草滥予昌擅泽予昌州……”读之不知所云。幸好附有意译如下：“今夕何夕矣，拏舟中流。今日何日矣，得与王子同舟……”据韦庆稳考证，这首越歌的语言是原始壮侗语。这样看来今壮侗语是从古越语演变而来的，古越人是今使用壮侗语言的民族的族源。

古越语跟今壮侗语的继承关系还可以在古文献中找到一些零星的确凿的证据。例如《越绝书·卷八》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古越语，词义是“盐官”，其中“余”是“盐”的意思，那么“朱”必定是“官”

的意思。壮侗语的词序特点是修饰语素后置于中心语素。所以“朱余”直译是“官盐”，意译是“盐官”。“余”字古音属侯部照母，可以跟壮侗语“主人”一词的语音相类比。例如属壮侗语族的傣语称“管理市场官”为“tsau3 (主)kat9 (街)。

古越语在后世主要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是演变为台语 (Tai Languages)。台语在国内相当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台语在国外是泰国和老挝的国语，还包括缅甸的掸语和阿萨姆掸族统治者曾使用的今已消亡的 Ahom 语，以及东南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

二是随着部分越人与汉人相融合，他们的语言也与当地汉语相融合。例如，据《史记·东越列传》载，西汉时东瓯（越之一种，地当今浙南）不敌闽越的攻击，向汉王朝求助，“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此书《集解》又载：“东瓯王广武侯悉其众四万人来降，家庐江郡。”他们的语言后世也溶入当地汉语。还有些越人不曾长途迁徙，留居江南，在大批汉人到来之后，他们的语言渐渐溶入当地汉语方言，只是在这些汉语方言里残留一些底层语言成分。

三是上古时代一部分百越人可能南迁越海到达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定居下来以后，与大陆的越人渐渐疏远，其语言演变为南岛语。南岛语系是一个地理分布非常辽阔的语系，从夏威夷一直延伸到马达加斯加，多种多样的台湾土著语言也属此语系。但不见于当代中国大陆。关于台湾土著是否大陆百越人的后裔这个问题，并没有唐宋以前的文献可考，但是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上古时代的台湾在文化上与大陆关系密切。台湾北部太平坑的绳纹陶文化，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

这种文化与大陆福建和江西的新石器文化有关，这两地的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千年。台湾西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年代在公元前一千年至两千年之间，与大陆沿海古文化也很接近。关于部分南越南迁南洋的历史以及和南岛语跟古越语的关系还须要进一步论证。

楚文化是公元前一千年里在长江中游流域的江汉流域蛮人部落中崛起的。在先秦时代，楚是一个自我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民族。据《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时，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文化也具有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饭稻鱼羹、火耕水耨、信鬼盛巫、崇拜龙凤、好食水产异兽、广用竹编制品，他们自编史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自铸货币。灿烂的楚文明和强大的楚国在长江以南彪炳了近千年。楚文化对于秦汉时代具综合性质的中国文明自有独特的贡献。

楚民族的语言本来不同于华夏语。楚的前身是南蛮之一种的荆蛮，其语言属南蛮𪗇舌之一种。《左传·宣公四年》所载两个用汉字转写的词汇可以肯定来源于早期楚语：“楚人谓乳𪗇，谓虎於菟。”《后汉书》也引用同样的词汇，不过“老虎”却是写作於菹。这个楚语词一直到晋代仍见于江南山民的口语。汉代扬雄《方言》录有这个�，晋代郭璞的注说：“於音乌，今江南山夷呼虎为於菹，音苟窵。”

到了战国时代楚文化渐渐与中原的华夏文化相融合，楚语也因长期跟华夏语交融，渐渐实现语言类型的转化，演变为汉语的一种方言。《楚辞》的韵部跟《诗经》基本一样。即使如此，当时的楚方言仍然保留原有的显著特色。《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话说，要使齐人学会楚方言，非置身当地人

不可。屈原所作《楚辞》，其语言显然已经实现类型转变，但是仍跟当时中原的古汉语明显不同。例如《楚辞》多用双音节词，如“犹豫、陆离、零落、耿介、荣华”等；多用双音节叠音词，如“翼翼、浪浪、菲菲、冉冉、杳杳”等；有的虚词用法不见于《诗经》，例如《招魂》中的“些”字用于句尾，表语气：“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在先秦时代，齐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是很引人注意的。

《孟子·万章上》载：“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东野人”即“莱夷”是东夷之一种，地处今山东东北部，当时还被视为野蛮人。其突出的风俗是“人殉”、“人牺”和“亚形祭祀”。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能是他们的原始家园。他们的语言一直到汉初还是自成系统，不与邻近语言相混淆，所以《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说：“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王。”能说齐语的人都成为齐王的百姓。这七十城地当今山东巨野以东至即墨一带。汉代以后东夷和齐语都不知所终，应该是渐渐融合进汉族和汉语。现代的胶东半岛方言较为特殊，但恐非古齐语遗存。

上古时代的南方除了有上述各民族及语言外，还有獠、濮、闽、巴、蜀等民族或部族，他们的语言应该与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有系属关系，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上古时代的北方诸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在亲属关系上与阿尔泰语系有关的主要有：原始蒙古部族东胡人的语言；原始突厥部落丁灵、坚昆人的语言；原始通古斯部族挹娄人的语言。与 Palaeo-Siberian 语有关的有匈奴语，这个语系现存的唯一语言是西伯利亚的 Kettish 语。与印欧语有关的是吐火罗语，公元前二世纪新疆北部和东部的绿州上的城市国家使

用这种语言。游牧部族月支和乌苏也使用类似的语言。他们移居西域的时代还不能确定。他们是上古时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明互相影响的中间人。

古代吐火罗语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发现的，当时西方的探险家到新疆一带活动，在吐鲁番、焉耆、库车一带发现并盗走大批古代语言的文献，多属五至八世纪。这种古代语言又分为两种方言：焉耆方言（又称焉耆语或甲种吐火罗语）和龟兹方言（又称为龟兹语或乙种吐火罗语），这种语言属印欧语系的 Centum (Kentum) 支派。印欧语系分成两个支派，Satem 和 Centum。传统的看法认为 Satem 是在东方，Centum 是在西方，用波浪说恰好能解释。吐火罗语的发现暴露了波浪说的缺陷。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词并不直接从梵文译过来，而是经过中亚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

这种古代语言的残卷是用婆罗谜文字写成的。最初人们尽管字母都认识，但是因为连写的，不但不能了解其中的语法结构，连一个个词都断不开来。后来逐渐发现其中有一些梵文借词，再进一步摸索出一些语法规律，考释工作才有了进一步开展的可能。

除了吐火罗语以外，古代中国的少数民族还曾使用过多种别的文字，其中一部分现代仍使用。这些文字的类型大多与汉字或藏文有关。用这些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汉语史和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重要的价值。试略述之。

其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文字如下：

女真语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女真族的语言，是满语的祖语。女真文字创建于十至十二世纪初年（1119年颁行）时当金代开国初年。十五世纪后半期起弃置不用。女真文字的字体

仿自汉字和契丹字，增减笔划而成。

女真文字的资料分文献、金石、墨迹三大类。其中以文献类中的华夷译语中的《女真译语》最为重要。女真文字的古文字对于历史、考古、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契丹 (*Khitan*) 语属于蒙古语族。契丹是古代北方民族，“辽”的前身。据辽史说，最初的契丹文字创制于 920 年（辽太祖神册五年），称为契丹大字。以后因不便使用，由皇子迭剌就回鹘人学习语言，按回鹘文的原理制定新契丹文，称为契丹小字。在内蒙古林白塔子发现的辽代帝王陵墓中的契丹文碑是“契丹小字”实物文献。契丹小字的字形大部分是模仿汉字的，由两个以上的简单汉字凑成一个契丹字，而且是拼音的。这种文字是后世女真文产生的滥觞。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下令停用，后渐废。

和阗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古代和阗、巴楚一带居民的语言。文字使用婆罗米字母直体。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这种语言的文献，多属五至十世纪。

粟特语也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是古代居住在中亚细亚一带的粟特人的语言。文字使用粟特字母、摩尼字母和叙利亚字母的“福音体”。本世纪初以来在新疆、甘肃和塔吉克的木格山等地发现这种语言的文献，多属四至十世纪。

鲜卑语是古代北方鲜卑族的语言。鲜卑族居今东北、内蒙一带，曾在北方建立北魏、北齐、北周。鲜卑语属蒙古语族，五、六世纪北魏时代的鲜卑文是蒙古语族最早的文字。文字的具体情况现在无从得知。

突厥文是中国古代说突厥语的民族使用的一种文字。古

代的格尔孜克族、维吾尔族都曾使用。因这种文字的主要碑铭是在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所以也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还有人认为突厥文与古日尔曼鲁尼文（die Rune）字母相似。故又称突厥鲁尼文。已发现的突厥文碑铭多是七、八世纪的遗物，突厥文是音素文字，有时同一个音位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关于突厥文最早的记载见于《周书·突厥传》：“其书类胡书”。

回鹘文和突厥文是记录同一种语言——古代新疆的突厥语的两种不同的文字。古代维吾尔人在 840 年西迁以后，逐渐废弃复杂的突厥文，改用粟特字母书写本族语言。回鹘文就是在粟特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音素文字。从十一世纪开始，南疆喀什一带的维吾尔人已因信奉伊斯兰教而改用阿拉伯字母，北疆一些地区回鹘文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纪。回鹘文文献保留至今的很多，其中著名的有《福乐智慧》、《真理入门》、《玄奘传》、《高昌馆杂字》、《高昌馆来文》。

蒙文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最早的文献是 1220 年的《成吉思汗碑文》。蒙文是拼音文字，行款是从左到右竖写。蒙文字母属回鹘文字母体系。

满文创制于十六世纪末。满文是在蒙古文字的基础上创制的，属于音节文字类型，大体上是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清代曾用满文书写公文，编写历史，并翻译大量汉籍。流传至今的满文文献有一千多种。最著名的老满文文献是《满文老档》。

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三种文字：突厥文、回鹘文和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突厥文的使用是在八世纪以前。八世纪后改用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十至十